

清末革命团体与秘密会党： 以同盟会武装起义为主

李平秀

内容提要 本文通过对同盟会六次武装起义的分析,重新考察清末革命团体与秘密会党之间的关系。本文视角有别于“孙中山中心史观”或“革命派中心史观”,认为传统所谓“同时起义”和“粤桂滇三省起义的领导机关”并不符合历史情况。其次,促进起义开展的组织大概可以分为四类:孙中山等同盟会人士构成的“设计组织”;天地会等秘密会党首领组成的“执行组织”;华侨、日本后援者构成的“援助组织”;有些清军将领及其所部组成的“辅助组织”。其中,设计组织应该对起义的失败负根本性责任。又次,这种武装起义的结构与同盟会的前身兴中会时期基本一致,均是以天地会等秘密会党首领为媒介形成同盟会与会党之合作关系,在合作中,秘密会党同样具有反抗清朝的主体意识和自觉意识。

关键词 革命团体 同盟会 秘密会党 天地会 武装起义

绪论

有关清末规模最大的革命团体同盟会与最典型的秘密会党天地会武装起义研究,迄今为止,大致分为两个方向:一类是从孙中山或者辛亥革命史的立场出发,考察武装起义在孙中山领导的革命活动中或在辛亥革命的展开过程中所占据的地位;另一类是从秘密会党史的角度出发,论述天地会等会党如何参与孙中山革命活动乃至辛亥革命的过程,以及会党在武装起义和革命过程中的作用。这些问题的研究者,不是专门从事孙中山、辛亥革命史研究,就是专门从事秘密会党史研究,他们往往会沿用其领域内约定俗成的视角、立场和眼光来看问题。另外,这些研究多强调孙中山与同盟会的作用和功能,而相对忽视直接参与武装起义的天地会等会党的主体性和自觉性。总的来看,这种研究视角可以说是“孙中山中心史观”^①的延伸,是在研究革命团体与秘密会党关系时突出表现出来的一种“革命派中心史观”。

^① Winston Hsieh, *Chinese Historiography on the Revolution of 1911: A Critical Survey and a Selected Bibliography* (Stanford: Hoover Institution Press, 1975), pp. 25—77.

在1985年北京召开的“孙中山研究述评国际学术讨论会”上,黄彦在其提交论文中写道:“广州起义和惠州起义过程的研究,基本轮廓是比较清楚的”,但“兴中会与会党的关系也不很清楚”。^①这一判断提示我们,兴中会与会党的关系,尚待深入发掘。进而言之,革命团体与秘密会党的关系,尚可拓展到对同盟会之前、之外的团体与秘密会党关系的解释与分析,这些团体主要是,广东兴中会、湖南华兴会、浙江光复会,只有将这三者及其结合体同盟会与秘密会党的关系分别进行深入研究,清末革命团体与秘密会党的关系才能全面揭示。无独有偶,在2010年广东省中山市举办的“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回顾与前瞻高峰论坛”上,王杰指出,目前关于兴中会、同盟会武装起义中华侨、会党、新军、民军等方面的研究虽然很多,但大多只注重分析“为什么”,而对“是什么”着墨嫌少,这样的研究几有“本末倒置之虞”,需要更为深入的研究和思考。他还指出,目前“广东会党与辛亥革命资料的整理与研究仍然乏力,有些问题得不到史料的有效支持”。^②可见,关于清末民初革命团体与秘密会党这一主题,还有很多问题有待进一步探讨。

分析既往研究,值得检讨的一个问题是,在分析同盟会与天地会武装起义时,如何看待所谓“同时起义”的传统说法。1905年同盟会成立后,开始计划在两广地区发动一系列武装起义,而“同时起义”是指同时在潮州、惠州、钦州、廉州发动起义,其中“以钦州、廉州为重点,潮州、惠州则是响应”。因此,同盟会一成立,革命党人就把目光注视到广西及相邻的广东边界地区,决定在两广发难,为此他们在越南河内设立“粤桂滇三省起义的领导机关”作为指挥武装起义的大本营。^③但笔者认为这一说法并没有充分的史料依据,需要再行讨论。

另一个有待论证的问题是关于武装起义中两个不同性质的团体,同盟会与天地会的关系问题。很多学者认为,孙中山领导的同盟会是起义“主角”,而其他被动员的天地会等秘密会党都是“配角”。此类观点影响殊大,成为主流,致使某些研究秘密会党的学者也断言,如果“得不到(兴中会、同盟会等所代表之)先进阶级的领导”,那么天地会等“洪门会党自发的反抗斗争,是不可能有所作为的”;天地会等秘密会党只不过是革命党人夺取清朝政权的“工具”而已,即天地会等秘密会党只是革命党人的“动员对象”,扮演着“雇佣军”的角色。而武装起义之所以无法取得成功也被归结为秘密会党本身的阶级落后性及组织的散漫性。^④然而,正如笔者所主张的那样,分析同盟会与天地会在武装起义中的关系时,采用近代革命团体与传统秘密会党相互“合作”的观点^⑤或许更为贴切,更为接近历史真相。

① 黄彦:《兴中会研究述评》,孙中山研究学会编:《回顾与展望:国内外孙中山研究述评》,中华书局1986年版,第317—318页。

② 王杰:《关于辛亥革命时期广东革命力量的几点思考》,孙中山研究会、孙中山故居纪念馆编:《孙中山·辛亥革命研究回顾与前瞻高峰论坛纪实》,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11、13页。

③ 金冲及、胡绳武:《辛亥革命史稿》第2卷,上海人民出版社1985年版,第155—156页;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399页;Edward J. M. Rhoads, *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 The Case of Kwangtung, 1895—1913* (Cambridge: Harva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p. 111.

④ 秦宝琦:《洪门真史》(修订本),福建人民出版社2000年版,第331页;丁旭光:《资产阶级革命派与广东会党》,《广东社会科学》1988年第1期,第96页;秦宝琦:《中国地下社会》第2卷(晚清秘密社会卷),学苑出版社2005年版,第519页。

⑤ 李平秀:《天地会和兴中会》,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史研究所政治史研究室、湘潭大学曾国藩研究中心编:《湘淮人物与晚清社会》,社会科学文献出版社2011年版,第373—390页。蔡少卿将辛亥革命时期会党作为联接资产阶级与农民联盟的媒介,他在说明革命党人与会党关系时,虽然使用了“联络”或“联合”等词语,但始终将二者设定为“领导(革命党人)与被领导(秘密会党)”关系,依旧没有摆脱“革命派中心史观”[蔡少卿:《论辛亥革命与会党的关系》,《中国近代会党史研究》(增订版),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9年版,第265—276页]。这种观点在周建超的著述中也反复出现(周建超:《秘密社会与中国民主革命》,福建人民出版社2002年版,第33—53页)。两位学者不仅缺少对武装起义构成的具体分析,而且完全没有提到本文重点说明的六次武装起义。所以其虽然提出了革命党人与会党的“联络”或“联合”关系,但却与笔者提出的“合作”关系在推导方法上存在较大差别。

从某种意义上说,史学即史料学。孙中山等革命党一翼对自身的革命活动有许多记录,但相形见绌的是,天地会等秘密会党一翼,却对自己的作为甚少记录,他们成为“失语”的群体。这也是造成研究格局畸轻畸重的重要原因。有学者在谈到秘密结社史料匮乏时指出:

史料,即所表象化的历史中,秘密结社几乎毫无意外地被表现为“他者”,秘密结社的成员没有自己的声音,也没有自己的文字,只不过是一种沉默的“被摄体”而已。即使少有的几位秘密结社的成员有幸留下了声音和文字,此内容常常以“他者”(政府审问机构、近代知识分子、革命家等)为媒介,才得以传达的。^①

正是由于这种记录上的不平等与差异,以及“他者化”的记录状况——秘密会党成员大多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所以自然在历史记录以及记录者方面处于劣势——在分析同盟会与天地会关系时,不论是从孙中山研究或者辛亥革命史研究的角度,还是从秘密结社史研究的角度出发,历史叙述的方向都会自然倾向于“孙中山中心史观”或“革命派中心史观”中。

本文将通过从1907年5月黄冈起义到1908年4—5月河口起义总共六次武装起义的分析,即同盟会接触新军之前与天地会等秘密会党一起在广东、广西、云南发动的武装起义,尝试重新考察上述问题。不过,由于目前有关秘密会党和辛亥革命史料的发掘尚不完备,所以有必要强调几点本文中史料使用的原则:第一,以事件发生当时所留下的史料为重点。例如,孙中山留下的演说、电报、信件等史料,只使用辛亥革命发生之前的。第二,在引用回忆录时,只选择那些能够通过其他史料进行对照互证而确认的内容,或者可以辅助说明当时情况的部分。第三,冯自由所大量记录的《革命逸史》等内容,不过向我们展示了事件的发生经过,如果有不详之处或者错误之处,本文将对照其他史料进行补充,或从批判的视角进行分析。第四,充分利用清政府留下的档案,如朱批奏折、电报档、海关档等。在以往的研究中,许多学者没有充分利用这些档案,但这些档案却从革命党人之外的角度记录了历史,为分析武装起义的结构和性质等提供了十分重要的线索。最后,革命党人主编的《中兴日报》和《中国日报》等报纸,可以作为二手史料,选择其中有用信息。基于以上史料使用原则,本文探索一种有别于“孙中山中心史观”、“革命派中心史观”所笼罩下的传统历史叙述,应用新文化史领域所提倡的“重读史料”方法^②,重新认识历史现象。

一、武装起义的开端与经过:从黄冈起义到防城起义

如前所述,学术界一般认为,同盟会创立后孙中山对武装起义的“原计划”是同时在潮州、惠州、钦州、廉州发动起义。这一观点源自著名国民党史家邹鲁提到的《孙中山复许雪秋电》,具体内容如下:

起义须与潮、惠、钦、廉同时发动,以便牵制清军。万勿孟浪从事,致伤元气。^③

^① 孙江:《近代中国の革命と秘密結社—中国革命の社会史的研究(一八九五~一九五五)—》,東京,汲古書院2007年版,第18页。

^② 조한욱:《문화로 보면 역사가 달라진다》, 책세상, 2000년, 13-14쪽, 61-78쪽。

^③ 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篇,商务印书馆1944年增订版,第718页。又见未名《丁未潮州黄冈二役别记》,丘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湖南人民出版社1981年版,第284页。该电报亦收入郝盛潮主编《孙中山集外集补编》(上海人民出版社1994年版,第34页),虽另拟题名,但仍来源于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

但是,若对当时武装起义的展开情况进行深入探讨的话,这份电文中提到的“同时起义”说法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武装起义的“原计划”并无关系。

首先要提到的就是“潮州起义”。如冯自由所述,潮州起义应该分为“潮州府城起义”和“潮州黄冈起义”两部分。^① 1905年夏,逗留欧洲的孙中山为创立同盟会,于6月11日离开巴黎远赴日本,7月初途经新加坡时,与九列、陈楚楠、张永福等人会合。^② 据张永福回忆:

我们因言及潮州已有余有关系的友人余既成、许雪秋在内地运动起义,闽省则此处派有黄乃裳前往宣传。孙先生一闻此语,知我们不特用文字宣传,亦能做实际上的工作,不胜喜慰。但以分道扬镳,终不如集中力量,事较易济。乃以组织同盟会,作大规模之运动为议。^③

以上回忆大致反映了孙中山组织南洋华侨革命党人准备潮州起义的情况。潮州起义从1904年初便开始策划,主要策划者是南洋华侨陈楚楠、张永福、黄乃裳、许雪秋、陈宏生等,而执行者是余丑、余通、陈涌波等潮州三点会首领。他们原拟于1905年4月19日发动起义,占领潮州府城,但因起义计划事前被泄露而失败。^④ 1906年4月6日同盟会在新加坡成立后,潮州起义有了进一步计划。陈楚楠回忆称:

在丙午年黄乃裳、许雪秋、陈芸生(即陈宏生)、肖竹漪诸同志先后来新加坡,在晚晴园见总理,报告闽、潮两地革命运动的成绩,并计划在闽粤交界的黄冈起义。这个计划总理接受了,就交下秘密电码暗约并军事策略,总理又电嘱在东京留学的同志方南岗、方端麟、乔义生等和一位日本义士萱野长知前往帮忙。^⑤

综合相关资料可知,1906年孙中山任命许雪秋为“国民军东军都督”,同年冬天许雪秋带领余丑、余通、陈涌波赴香港,与冯自由见面,加入同盟会。1907年2月19日他们决定发动起义占领潮州府城,余丑等在饶平县浮山墟召集千余人准备起义,但事与愿违,起义准备再次中断。之后许雪秋为准备下一个计划而返回香港。^⑥ 冯自由将以上两次夭折的潮州起义合称为“潮州府城起义”。

上述两个计划夭折后不久,潮州黄冈起义却突然发生。据冯自由记述,1907年5月中旬,乡民们正在黄冈北门外唱戏时,防兵在舞台前调戏妇女而遭乡民反击,守备蔡河宗下令逮捕乡民。这时当地会党两名余姓乡民被逮捕,并押送至协署。随后,余丑等三点会首领在城外的连厝墓召集同志商讨营救这两人的对策,认为若不起事,两人均无生还可能。于是,1907年5月22日晚,余丑、余通、陈涌波等人带领千余名三点会成员攻击协署,与蔡河宗军交战,翌日上午成功占领黄冈城。两

①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1928年初刊),广西师范大学出版社2011年版,第325—338页。

②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337页。

③ 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1933年初刊),章开沅、罗福惠、严昌洪主编:《辛亥革命史资料新编》第1卷,湖北人民出版社2006年版,第76页。

④ 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325—326页;冯自由:《东军都督许雪秋》,《革命逸史》第2集(第1—6集:1939—1948年初刊),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183—184页;又见未名:《丁未潮州黄冈二役别记》,丘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上册,第279—282页。

⑤ 陈楚楠:《晚晴园与中国革命史略》(1940年原刊),丘权政、杜春和选编:《辛亥革命史料选辑续编》,湖南人民出版社1983年版,第38页。

⑥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394页;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326—327页;冯自由:《丁未潮州黄冈革命军实录》,《革命逸史》第5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88页。

广总督周馥连忙集结附近清军进行镇压,5月26日起义军在洪洲的战斗中败北,并于27日溃散。^①

当时,周馥将此事件定义为三点会突然起事,并没有认识到该事件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有任何联系^②,但这就是同盟会成立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策划发动的首次起义,即“潮州黄冈起义”。尽管从黄冈起义的人员构成看,这次起义确实是夭折的府城起义的延续,但它具有突发性,并不是在孙中山及同盟会的严密计划下发动的。并且,作为国民军东军都督的许雪秋,在黄冈起义爆发时仍然逗留在香港,他在两天后的5月24日才收到消息急忙前往黄冈,但当他到达山头时起义军已经溃败。^③

接下来的便是“惠州七女湖起义”。据冯自由记述,孙中山在1907年春先后派遣余绍卿、黄耀庭、邓子瑜从新加坡远赴香港。首先到达香港的是在阳江、阳春远近闻名的大盗余绍卿。他于1907年4月中旬抵达香港,负责阳江、阳春方面的军事事务,随后返回内地销声匿迹。黄耀庭曾作为兴中会时期惠州起义的前锋,于5月上旬抵达香港,负责惠州方面的军事事务,但在听闻香港警察署已获知其入境消息后,黄耀庭又匆忙返回新加坡。最终,孙中山只能将值得信任的同志邓子瑜派往惠州。5月下旬,潮州方面的军事局面紧迫,邓子瑜让天地会首领陈纯、林旺、孙稳在归善、博罗、龙门等地准备举事,而其中在归善县知名墟市七女湖(今汝湖镇)发生的起义便是“惠州七女湖起义”。该起义于6月2日爆发,义军在泰尾、三连、柏塘、八子爷等地与清军展开多次战斗。6月12日两广总督命令驻惠州及周边的清军出兵镇压,水师提督李准也亲自带兵前往惠州支援。此后,起义军与清军进行了十天左右的混战,最终因弹尽粮绝而告败。^④

当时,两广总督周馥因黄冈起义被问责而卸任,据他发送给外务部的电报可知,由于被捕会党成员供认七女湖起义以及黄冈起义都是在孙中山指示下进行的,所以他要求越南总督、香港总督搜捕孙中山、邓子瑜等七女湖起义主谋。^⑤虽然冯自由断定孙中山原本就有“惠潮同举之计划”^⑥,但这只是他根据该事件结局而推断的。实际上,孙中山在创立同盟会之后曾援助南洋华侨筹备的潮州武装起义,又曾派遣余绍卿到地理位置与潮州相对之阳江、阳春进行呼应,而并无同时发动潮州和惠州起义的计划。孙中山不过是在阳江、阳春的起义计划化为泡影后,才匆忙派遣黄耀庭、邓子瑜到惠州,而且邓子瑜领导的七女湖起义也是在潮州起义结束后才发动的。

最后是“钦廉防城起义”。据冯自由记述,1907年春,钦州三那地区乡民刘思裕等无法忍受官吏对糖捐的榨取而组织万人会,由于在对抗官府的过程中乡民势力逐渐扩大,两广总督周馥遂命令统领郭人漳、标统赵声等人出兵镇压。继而,刘思裕等乡民牺牲,乡民代表梁建葵、梁少廷前往越南河内向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请求救援。此时,孙中山和黄兴认为,郭人漳、赵声为革命党,可以通过这两人的协助伺机起义。随后黄兴前往钦州,逗留在郭人漳部队中,孙中山还同时派遣胡毅生到赵声

①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401—402页;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329—332页;冯自由:《丁未潮州黄冈革命军实录》,《革命逸史》第5集,第88—92页。

② 《两广总督周馥为黄冈会党踞寨戕官事致军机处电》(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五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北京师范大学历史系编选:《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457—458页。

③ 冯自由:《东军都督许雪秋》,《革命逸史》第2集,第186页。

④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402—403页;冯自由:《丁未惠州七女湖革命军实录》,《革命逸史》第5集,第100—102页。

⑤ 《开缺两广总督周馥为要求港督驱逐孙文事致外务部电》(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四日)、《开缺两广总督周馥为要求越南总督驱逐孙文事致外务部电》(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开缺两广总督周馥为要求港督驱逐邓子瑜致外务部电》(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九日),广东省档案馆编译:《孙中山与广东——广东省档案馆馆藏海关档案选译》,广东人民出版社1996年版,第697—698页。

⑥ 冯自由:《丁未惠州七女湖革命军实录》,《革命逸史》第5集,第100页。

所驻屯的廉州,王和顺则作为“中华民国军南军都督”负责钦州和廉州的军务。但孙中山的以上计划也是在王和顺在三那驻扎几个月后,随着驻屯防城的原清军内应刘永德和李之焜表现出起义意图,才得以实施的。1907年9月1日王和顺带领会党军由王光山出发进攻防城,发动起义,三天后占领该地。随后起义军进攻钦州城,但作战失败,于是途经南劳墟、擅墟准备进攻灵山,仍旧事与愿违,在重返三那后起义军不得已于17日解散。最后,梁建葵、梁少廷等人带领起义军撤退到十万大山,王和顺等人返回越南。^①

冯自由并没有记述防城起义过程的详细日期。据钦廉道王承恩禀告,刘思裕组织万人会对抗官府发生在4月29日。^② 据清陆军部档案,刘思裕被郭人漳炮击致死的日期为6月12日。^③ 在刘思裕牺牲后,梁建葵、梁少廷才向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提出救援请求,孙中山等正式派遣王和顺,利用郭人漳、赵声,在钦州、廉州发动武装起义的时间为6月中旬以后。从时间上看,黄冈起义已经于5月失败,七女湖起义也于6月22日告终,所以说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钦州、廉州武装起义计划是在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结束后才推进的(参见表1)。

表1 潮州府城、黄冈、七女湖、防城起义的筹划、爆发、起义军解散时间一览表

	潮州府城起义 ^①	黄冈起义 ^②	七女湖起义 ^③	防城起义 ^④
起义筹划时间	1904年		1907年5月中旬	1907年6月中旬
起义爆发时间	1905年4月19日(未爆发) 1907年2月19日(未爆发)	1907年5月22日	1907年6月2日	1907年9月1日
起义军解散时间		1907年5月27日	1907年6月22日	1907年9月17日

资料来源:①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334、394页;张永福:《南洋与创立民国》,第76页。②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401页;冯自由:《丁未潮州黄冈革命军实录》,《革命逸史》第5集,第88—99页。③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402—403页;冯自由:《丁未惠州七女湖革命军实录》,《革命逸史》第5集,第99—104页。④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411—412页;冯自由:《丁未钦州防城革命军实录》,《革命逸史》第5集,第104—109页。

如果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真有潮州、惠州、钦州、廉州“同时起义”计划,表1中归纳出来的起义筹划、发动、起义军解散时间就不会如此的不一致。如上所述,潮州起义是1904年由南洋华侨与潮州天地会首领合作筹划的,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只不过是在同盟会创立后,对1907年黄冈起义进行了支援。虽然冯自由强调“惠潮同举之计划”,但突然爆发的七女湖起义仅仅是黄冈起义的后续行动,就连防城起义也是在黄冈起义、七女湖起义失败后才正式准备发动的。而且我们根本找不到起义指挥者许雪秋、邓子瑜、王和顺等人在发动起义前,相互联系、准备、商议的任何可信记录。总之,支持“同时起义”说的史料根据,即上引邹鲁《孙中山复许雪秋电》中的内容,只能解释为孙中山的一种“个人愿望”。实际上,革命党人或者国民党史家留下的资料所描述的武装起义,与现实中的武装起义,不论是在领导者、组织者,还是在起义开端、经过和其他细节上,都有一定差距,故我们不能将这些内容完全视为事件的真相,亦不宜含混论之。

①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411页;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345—349页;冯自由:《南军都督王和顺》,《革命逸史》第2集,第200—201页;冯自由:《丁未钦州防城革命军实录》,《革命逸史》第5集,第104—109页。

② 《两广总督周馥为钦州刘思裕等聚众抗捐拒敌官兵军事致军机处电》(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四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第456—457页。

③ 《关于三那抗捐斗争的禀报》(光绪三十三年八月以后),中国第二历史档案馆编:《中华民国史档案资料汇编》第1辑,“辛亥革命”,江苏人民出版社1979年版,第16页。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400页。按:刘思裕死亡日期为5月12日,有误。

二、孙中山对武装起义的“原计划”

那么,同盟会的领导者孙中山到底制订了怎样的武装起义计划呢?如果说他的“原计划”不是如潮州、惠州、钦州、廉州“同时起义”,他又有怎样的构想呢?我们可以从孙中山留下的以下记录中找到线索。

同盟会成立前,1905年7月28日,孙中山曾在与宋教仁、陈天华等会面时,对武装起义的原则做出过如下论述:

现今大势及革命办法,大概不外联络人才一义。中国现在不必忧各国之瓜分,但忧自己之内讧,此一省欲起事,彼一省亦欲起事,不相联络,各自号召,终必成秦末二十余国之争,元末朱、陈、张、明之乱,此时各国乘而干涉之,则中国必亡无疑矣。故现今之主义,总以互相联络为要。方今两粤之间,民气强悍,会党充斥,与清政府为难者已十余年,而清兵不能平之,此其破坏之能力已有余矣……一旦发难,立文明之政府,天下事从此定矣。^①

综上所述,孙中山担心的不是外国列强的瓜分,而是国内各种反清力量的分裂。他强调人才、义士联合的重要性,并指出三条革命策略:第一,开展武装起义时,一定要重视省与省之间的联系;第二,起义的主要地区是两广;第三,革命军的主要军事力量是以两广为主广泛活动的天地会等秘密会党。

孙中山在同盟会即将成立之际,更是进一步强调一定要以省与省之间的联系为基础,通过秘密会党展开武装起义。1905年8月13日在东京留学生欢迎会上孙中山发表演说:“鄙人往年提倡民族主义,应而和之者特会党耳,至于中流社会以上之人,实为寥寥。”^②1905年8月20日同盟会成立大会上,由黄兴、陈天华等八人起草的《中国同盟会总章》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修正通过,其中总章第五条规定:“凡国人所立各会党,其宗旨与本会相同,愿联为一体者,概认为同盟会会员。”^③如上所述,以孙中山为主的革命党人已经认识到秘密会党作为下层武力的重要性。

同盟会成立后约一年半,在1907年1月5日与日本人池亨吉的谈话中,孙中山才首次谈到武装起义的具体计划。据池亨吉记述,孙中山说:

自去年秋江西省萍乡之乱发生,风云忽急,全国震荡……如不乘此时机起事,我党又何时能如陈、吴之救国?不惜牺牲,我志已决。即将传檄十八省会党,联络声气,立刻举事。可使广东省罗定府的志士为前锋,他们与当地镇台的将弁等密结盟约,不战即可据有广东省城,现在只待领导者的号令下达。因此,黄兴君将先期代表我中国革命同盟会,乘搭十一日自横滨启程的便船,匆匆赴会,并可得汪兆铭君同行。^④

① 《与陈天华等的谈话》(1905年7月28日),广东省社会科学院历史研究室等编:《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5年版,第276页。

② 过庭(陈天华):《纪东京留学生欢迎孙君逸仙事》,东京《民报》第1号,1905年11月26日,中华书局2006年影印版,第70页。

③ 《中国同盟会总章》(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84页。

④ 《与池亨吉的谈话》(1907年1月5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32—333页。

据宋教仁日记,黄兴于1月5日离开日本前往香港,准备发动武装起义。^①此外据冯自由记述,上面提到的“镇台的将弁”就是依照两广总督命令驻扎在肇庆的郭人漳部。孙中山因为知道郭人漳与革命党有联系,所以急忙派遣黄兴、汪精卫、萱野长知到肇庆,催促郭人漳起事,突袭广州。^②

对孙中山的广州占领计划,清政府似乎也有所耳闻。据《中国日报》报道,清政府发电报通知两广总督,某党党羽正迫近广州准备趁岁暮举事,令其加紧防备,由此两广总督也召集水师提督李准等谋划应对策略。^③但是孙中山的计划随着郭人漳重返钦州而破产。据冯自由记述,黄兴和汪精卫一直逗留在香港的松原旅馆,期间同盟会评议部议员张树楠造访,告知他们郭人漳前往钦州剿匪,而且两广总督已经获知他们的行踪并要求香港总督引渡。于是,黄兴派遣胡毅生前往钦州监视郭人漳动向。^④不久,黄兴于2月15日重返东京后向民报社同盟会会员说:“广东近日非常戒严,香港亦难居。”^⑤

这样,在孙中山占领广州计划无疾而终之后,1907年5月22日潮州黄冈起义和6月2日惠州七女湖起义分别发生。针对这一局面,6月5日孙中山在给张永福的信中写道:“日来潮起于东,钦廉应于西,全省风动。尚有数路,次第俱发。当合广、韶、惠、潮、钦、廉诸军,以联为一气,则粤事机局宏远,大有可为也。”^⑥两天之后,孙中山又致平山周电称,“两广义师已分道并起,云南、四川皆可响应”^⑦,以请求武器援助。而实际上,这里孙中山提到的内容并不符合事实,只是其愿望而已。因为当时除了七女湖起义正在进行中以外,不论是占领广州的计划,还是黄冈起义都已经失败,就更不要说云南、四川的响应,以及钦州和廉州发动武装起义的进展了。此外,在相继发出以上信件和电报前后,孙中山又致函萱野长知称:“今东军将起,欲得于军事上有学问经验之人以为顾问。弟念我兄雄武过人,谨以东军顾问之任相托,望襄助都督,以建伟业,并恳延揽同志,以资臂助。”^⑧这里的“东军”指潮州和惠州的起义军,而从当时的形势来判断,“伟业”应指设立军政府。也就是说孙中山打算在东军武装起义成功后,占领广州,设立军政府。但是随着惠州七女湖起义的失败,孙中山利用东军占领广州的计划也无法再行推进。

1907年9月1日钦州防城起义爆发。起义进行期间,为解决军饷、军械、外交等问题,孙中山于9月3日致函宫崎寅藏称:

近日西军已发,一举破防城县,众数千人,极得民心。现已全军北趋,以取南宁……如一发则两军合并,广西不难定也……此军初起,而势力甚固,地位甚稳,专俟一取南宁,则革命军之基础已成,广东、长江等响应之师相继而起,事可大有为也……萱野君想已到东,祈转告西军已发,东军之事望速经营,至以为望。^⑨

这里的“西军”是指与东军相对应的钦州、廉州起义军。孙中山计划令西军占领南宁,以奠定革命基础。1907年10月8日孙中山在致邓泽如函中,明确指出:“现在全军进取南宁府城,以南宁主广

① 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中华书局1991年版,第110页;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704页。

② 冯自由:《香港同盟会史要》,《革命逸史》第3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第228页。

③ 《党人起事之风谣》,香港《中国日报》,1907年2月18日,第3页。

④ 冯自由:《香港同盟会史要》,《革命逸史》第3集,第228页。

⑤ 毛注青编著:《黄兴年谱长编》,第111页;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第714页。

⑥ 《复张永福函》(1907年6月5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36页。

⑦ 《致平山周电》(1907年6月7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37页。

⑧ 《致萱野长知函》(1907年夏秋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37—338页。

⑨ 《致宫崎寅藏函》(1907年9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42—343页。

西之中心点,得南宁则北取桂林以出湖南,东取梧州以出广东,革命之基础可固……南宁破后,弟即于该处建立军政府。”^①

据以上论述,孙中山的武装起义“原计划”可以概括如下:第一是“大计划”,即孙中山希望,在以某省为主发动武装起义后,在控制该省的基础上,进一步统一全国。如前所述,孙中山对此很早就有了明确想法,就是将两广地区作为“大计划”的核心地区。第二是“小计划”,即为了实现“大计划”,要先以某个省城为根据地设立军政府。从“小计划”的层面看,孙中山希望在两广地区多个城市展开武装起义。不论是在哪个城市,只要该城市的武装起义成功,就以该城市作为踏板,进一步占领省城,设立军政府,然后再以此为基础扩张革命势力。最初,孙中山计划在罗定、肇庆、潮州、惠州等地区发动武装起义(其中有黄冈起义和七女湖起义的爆发),通过“东军”占领与这些地区临近的广东省城广州,在此设立军政府。随着该计划的失败,孙中山又计划在钦州、廉州发动武装起义(有防城起义的爆发),依靠“西军”占领广西省城南宁。总之,同盟会成立以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正是通过这些“大计划”、“小计划”来推进武装起义展开的,尤其是其中的“小计划”变数很大,具有随机应变性质。所以从这个角度看,学术界所说的潮州、惠州、钦州、廉州“同时起义”计划根本不存在,只不过是孙中山几个“小计划”之结果进行的总结罢了。

三、武装起义的接连爆发:从镇南关起义到河口起义

孙中山于1907年10月8日为介绍两广军事进展并促筹款而致函邓泽如等:

弟前函云数月以来,两广革命军已竖旗起义,破城略地……弟自南来,即欲经营大军,在钦廉发起,以东西兼顾,沛然进取……有两广以为根本,治军北上,长江南北及黄河南北诸同志必齐起响应,成恢复之大功,立文明之政体,在此一举。我同志诸兄筹饷之功,必与身临前敌者共垂千古而不朽矣。^②

因为防城起义在一个月之前即已失败,所以信中所言似乎有夸张成分,但也说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想要通过东军、西军推进武装起义设立军政府的愿望一直没有改变。之后的半年时间里,东军方面毫无进展,西军方面发动了如下一系列武装起义(见表2)。

表2 镇南关、上思、河口起义的筹划、爆发、起义军解散时间一览表

	镇南关起义 ^①	上思起义 ^②	河口起义 ^③
起义的筹划时间	1907年11月21日	1908年1月	1908年4月
起义的爆发时间	1907年12月1日	1908年3月27日	1908年4月29日
起义军解散时间	1907年12月8日	1908年4月中旬	1908年5月下旬

资料来源:①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年谱》,中华书局1980年版,第90页;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416—418页;冯自由:《丁未广西镇南关革命军实录》,《革命逸史》第5集,第88—99页。②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428—429页;冯自由:《戊申钦州上思革命军实录》,《革命逸史》第5集,第128—131页。③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429—431页;冯自由:《戊申云南河口革命军实录》,《革命逸史》第5集,第140—154页。

① 《致邓泽如函》(1907年10月8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46—347页。

② 《致邓泽如函》(1907年10月8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45—347页。

首先是镇南关起义。1907年11月21日,孙中山在河内召集黄兴、胡汉民及三合会首领等商量计划发动镇南关起义。^①据冯自由记述,孙中山先曾命令王和顺负责镇南关的军事活动,但当时与革命党有所联系的广西凭祥地区土司李祐卿却与王和顺不和,孙中山只好派黄明堂、关仁甫接替王和顺。最终,起义于12月1日爆发,黄明堂率先带领起义军进攻那模村,随后接连占领镇北、镇中和镇南三台。第二天,孙中山、黄兴、胡汉民也抵达镇南关。不过,由于4日陆荣廷率领的清军开始反攻,孙中山、黄兴、胡汉民等不得已在当晚与黄明堂作别,于5日重返越南河内。之后数天,丁槐、龙济光率领四千清军与陆荣廷部会合,并围攻义军,起义军虽然死守三炮台,但不久即弹尽粮绝,8日遂放弃炮台,黄明堂将起义部队撤退到中越边境线上。^②

接下来是上思起义。据冯自由记述,镇南关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于1908年1月24日被逐出越南,前往新加坡躲避。此时孙中山命令黄兴率领镇南关及十万大山剩余兵力,重返钦州发动起义。之后黄兴致信驻屯在钦州的郭人漳,希望他提供弹药,并伺机与起义军进行呼应。1908年3月27日黄兴与黎仲实等人从越南芒街出发,与起义军合力,一起进攻钦州。到达广东东兴(今广西东兴市)后,黄兴以“中华民国军南军总司令”的名义发布告示。革命军与清军分别于3月29日、4月2日在小峰、马督山展开激战。最终,革命军未能攻克钦州城,且虽曾浴血抵抗,还是因弹尽粮绝而败北。随后黄兴、黎仲实相继返回越南,起义军也重返十万大山。^③

最后一次起义是河口起义。同样据冯自由记述,1908年4月,孙中山命黄明堂发动起义,王和顺、关仁甫在旁辅佐,并派河内的黎仲实等八名革命党人赴老街补给军需用品。4月29日,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率领起义军在河口发动起义,最终占领河口城,随即以“南军都督黄明堂”名义发布安民告示。随后,黄明堂准备经蒙自进军昆明。为此,关仁甫率部分义军由曼耗(蛮耗)、个旧北上进攻蒙自。但5月3日,起义军失利,退兵河口。与此同时,王和顺率另一部分义军于4日占领南溪,6日占领古林箐。至此,义军虽欲进一步进攻蒙自,但由于弹药军饷不足,只能暂时驻屯下来等待补给。正当此时,黄兴于5月3日从钦州回到越南,5日孙中山便任命其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统率全军,7日黄兴抵达河口。然而起义者并不随他进攻蒙自,无奈,黄兴重返越南,准备调动钦州起义军赴滇作战。不幸的是,黄兴于11日返回河内途中,被法国警察逮捕并驱逐出境。随后清军开始集合兵力攻击王和顺大营。22日王和顺赴河口与黄明堂商议占领思茅,并以此为根据地进攻昆明。但这一计划未能实现,王和顺只能带领义军退回河口,士气大挫。最后,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等带领起义军撤退到中越边境。^④

以上便是冯自由记述的从镇南关起义到河口起义的简要过程。但在记述中,冯自由并未阐明以下疑点: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为什么要占领镇南关?镇南关起义与上思起义有怎样的联系?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又为什么突然将目标从广西南宁转移到云南昆明?

从镇南关的地理位置看,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很有可能将其视为钦州、廉州起义军进攻南宁的突破口。1908年1月4日《中兴日报》报道,闻桂省京官得有报告称:“(革命)党据炮台后,势焰甚盛,钦、廉各党附之若鹜,竟有北窥龙州、连城,旁窥平而,直过镇南关之势,若不迅速防御,恐南方之边患,未

① 广东省哲学社会科学研究所历史研究室等合编:《孙中山年谱》,第90页。

②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416—417页;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358—363页;冯自由:《南军都督王和顺》,《革命逸史》第2集,第202—203页;冯自由:《丁未广西镇南关革命军实录》,《革命逸史》第5集,第120—123页。

③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428页;冯自由:《中华民国开国前革命史》,第366—369页;冯自由:《戊申云南河口革命军实录》,《革命逸史》第5集,第128—131页。

④ 陈锡祺主编:《孙中山年谱长编》上册,第429—431页;冯自由:《南军都督王和顺》,《革命逸史》第2集,第203—204页;冯自由:《戊申云南河口革命军实录》,《革命逸史》第5集,第141—146页。

易猝平”。^① 五天后《中兴日报》又刊登文章对此进行强调：“革命军自破镇南关后……今镇南关之军，由西而东，钦、廉之军由东而西，以相会合，目前正如江汉合流，一泻千里，想不久定有大战，以定全局也。”^②当然，实际情况并没有像报纸预测的那样升级为一场“大战”。镇南关起义和上思起义的最终目标是攻陷广西南宁，设立军政府，这与之前钦州防城起义一脉相承。1907年10月8日防城起义失败后与镇南关起义策划前，孙中山写给邓泽如的信，即反映这一点：“因现时两广之兵皆聚于南宁一带，若南宁即破，则前无强敌，大军所至，迎刃而解矣。此为胜负之关头，革命军第一级着手处也。”^③正是因为当时东军方面毫无进展，使孙中山对西军方面寄予如许希望，并孤注一掷想要攻克南宁，进而在此地设立军政府。镇南关起义和上思起义就是孙中山这种意图的最直接表现。

对河口起义的筹备，冯自由解释说：“滇事于镇南关发难以前，早已著手运动，至1908年4月，事机渐熟。”^④但迄今为止，尚未找到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镇南关起义前筹划云南军事活动的记录，而镇南关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在1908年2月8日写给池亨吉的信中仅有只言片语提及“云南军”：于是飘然离开河内，重过沦落天涯的亡命生活。但留黄兴及胡汉民兄弟，委以当地及广西一带的筹划事宜。黄兴君更为奋发，已进入某地点。尤以云南军精心准备，照其预定计划展开工作，但何时起事，现尚难以奉告。^⑤在信中，黄兴、胡汉民、胡毅生已在广西的工作内容便是钦州上思起义，而云南军所准备者，即河口起义。由此可知，河口起义的筹备，别说在镇南关发难以前早已动手，就是在上思起义的过程中也没有完成具体策划和活动方略。

在上思起义即将失败之时，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才计划发动河口起义。反观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将目标从南宁转向昆明的背景来看，从黄冈起义到上思起义，所有为了占领广州或南宁而发动的起义都以失败告终；而以两广总督为首的地方官员已经注意到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的活动；而且，起义军士气已经受挫，当地百姓对起义军的信任也大不如前。^⑥这些情况使得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有必要将攻击目标从南宁转向昆明。特别是，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转移目标之际，三点会正活跃于滇桂间军事要冲河口等地区。从署理云贵总督丁振铎的奏折中可知，自1903年起三点会就在河口至蛮耗沿河地区勒索抢夺商船。^⑦1907年12月云贵总督锡良也奏称，数年前三点会扩散到河口、蛮耗等地，10月，三点会分派忠义堂举办六次拜会活动，一个月之内聚集千名以上党羽，图谋定期叛乱，由于各地知县置之不问，三点会势力日益扩大。^⑧对于欲以黄明堂、王和顺、关仁甫等天地会首领为主干展开武装起义的革命党人，三点会在河口等地的发展显然为发动武装起义提供了良好的前提条件。关仁甫在回忆录中提到：“余以义之所在，穷亦当干，毅然于1908年4月14日赴滇，招集（三点会）旧部，并运动防军。”^⑨这句话很好地印证了以上分析。

① 《桂党大帜情形（广西）》，新加坡《中兴日报》，1908年1月4日，第2版；又见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编：《十次起义史料》，《革命文献》，第67辑，“中央文物供应社”1974年版，第105—106页。

② 《本馆专函：革命军势如破竹》，新加坡《中兴日报》，1908年1月9日，第2版；又见《十次起义史料》，《革命文献》第67辑，第106页。

③ 《致邓泽如函》（1907年10月8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46页。

④ 冯自由：《戊申云南河口革命军实录》，《革命逸史》第5集，第141页。

⑤ 《致池亨吉函》（1908年2月8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58—359页。

⑥ 胡汉民：《胡汉民致孙总理报告钦军解散及滇桂军务书》（1908年4月24日），冯自由：《革命逸史》第5集，第136页。

⑦ 《署云贵总督丁振铎等奏派兵搜剿河口会党情形折》（光绪二十九年六月十六日），《云南档案》2011年第6期，第12—13页。

⑧ 《云贵总督锡良奏思茅威远会党图谋起事片》（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七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第721—723页。

⑨ 关仁甫：《革命回忆录》，全国政协文史资料研究委员会编：《辛亥革命回忆录》第7集，文史资料出版社1982年版，第245页。

四、武装起义各参与组织之相互关系

同盟会成立以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利用天地会等会党从1907年5月至1908年5月大约一年时间里,从潮州起义到河口起义共发动六次武装起义,但最终均失败。失败原因,一般被归结为天地会等会党的自身弱点,但实际上这只是其中一部分原因。如果想要找到其中更重要的原因,就必须厘清武装起义各参与组织间的关系。

武装起义“原计划”中,孙中山为实现其“大计划”而制订了数个“小计划”,而实施这些小计划又有三个先决条件:第一,资金、武器的确保;第二,秘密会党的动员;第三,对清军的策反。但同盟会凭借自身力量难以满足上述任何一个条件,唯有通过其他组织的协助才能实现。从潮州起义到河口起义,主要的参与组织或人员可分为四类:第一类是孙中山等同盟会核心人士;第二类是南洋华侨组织以及日本后援者;第三类是天地会等会党;第四类是郭人漳等清军将领。从武装起义的展开过程看,孙中山等同盟会核心人士是“设计组织”,南洋华侨组织和日本后援者是“援助组织”,天地会等会党是“执行组织”,郭人漳等清军将领则是“辅助组织”。在这四部分力量中,以会党最为重要,一切筹谋均需要通过它来付诸实行,其他三个“组织”均围绕着“会党组织”来工作。

首先了解一下资金、武器的筹集情况。1909年10月下旬孙中山在致吴稚晖信中写道,从潮州起义到河口起义大约花费了二十万元左右,大半都是由南洋各地集资而来。^①另外,据张玉法研究,在同盟会中,孙中山、汪精卫、邓泽如、胡汉民等人主要负责筹集资金。除匿名者外,孙中山、铃木、李卓峰、曾锡周、马培生、黄景南、张人杰等是主要资金捐赠人。而这些资金主要来自日本东京、南洋、越南河内、泰国以及法国巴黎,共计二十七万五千港元。^②

无论如何,起义成功需要大笔资金支援,且尽管孙中山等竭尽所能,但资金和武器仍旧远远不够。据冯自由记述,潮州和惠州起义军约需军饷十万元,孙中山向香港富商陈庚如、陈席儒、杨西岩请求支援,但遭到拒绝。^③七女湖起义过程中,1907年6月7日,孙中山致电平山周,请求武器支援^④,一周后再次致电平山,恳求“订购一万(支枪),先送铕二千,弹二百万”。^⑤其实,不仅上述两次起义,在每次武装起义筹划过程中,革命党都曾遇到资金与武器严重匮乏的问题。1907年8月23日,孙中山致信张永福、陈楚楠,称:“如潮事发起,当拨新式快枪数千……前在星坡得各同志捐助三千元,其数实不敷用……若能得数千元之数专为潮用,更得数千元交子瑜兄再举于惠州,以谋牵制,则东路之师必大盛。此万余元之运动费,不能不望之星坡同志也。”^⑥孙中山按照该计划一方面呼吁南洋华侨捐献革命资金,另一方面用部分资金购买武器。这就是冯自由记述中提到的“汕尾运械”。具体而言,七女湖起义失败后,孙中山努力通过日本人萱野长知购买武器。当时孙中山募集到一万日元,冯自由先将这笔钱汇给萱野长知,后在日本后援者的担保下,购得新式连发枪两千支、子弹一百二十万发以及部分其他装备。按照1907年10月初计划,这批武器在许雪秋运作下第一步运往汕尾,第二步转移到平海,但此计划由于清军守备严密而流产。最后,这批武器在运回

① 《致吴稚晖函》(1909年10月下旬),《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21页。

② 张玉法:《清季的革命团体》,台北,中研院近代史研究所1975年版,第439页。

③ 冯自由:《丁未潮州黄冈革命军实录》,《革命逸史》第5集,第98—99页。

④ 《致平山周电》(1907年6月7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37页。

⑤ 《致平山周电》(1907年6月14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37页。

⑥ 《复张永福陈楚楠函》(1907年8月23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38—339页。

日本的过程中又被日本警察没收。^① 这使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陷入严重财政困难,同时使潮州、惠州方面军事作战受到影响。

西军方面的情况也不乐观。防城起义期间,孙中山于1907年9月13日致函宫崎寅藏称:“现时最急者军饷、军械两大宗,望悉力筹划,以相接济”。^② 而防城起义失败后,孙中山于1907年10月1日致函何佩琼称:“义军屡破虏兵,清朝尽调广东、广西之兵来战,我军虽勇,惟军火粮饷尚须源源添足。”与此同时,他“特派汪精卫、黄龙生、刘岐山三人来西、堤两岸(即西贡和堤岸),与各同志面商,设法速筹巨款,接济军需”。^③

在镇南关起义到河口起义阶段,孙中山也受到武器、资金不足的困扰。1908年1月3日孙中山致函董野长知,陈述“汕尾运械”计划由于宫崎寅藏等担保的贷款到期而发生了财政问题,因此,“自南关役后,机局未始无进步,然以经济问题不能解决,故做事不能快意”。^④ 1908年4月22日孙中山又致电马来西亚挂罗庇劳(Kuala Pilah)同盟会会员称:“刻下有最急之需而不容缓者,有广西营勇约降之花红及饷需万余元,有云南待举之接济需万余元,有钦军之加补子弹需二万余元,此三宗统计不过五六万元耳”,进而强调“革命军定章称:凡出资助饷者,军政府成立之后,一年期内四倍偿还,即万元还四万元也,并给以国内各等路矿商业优先权利”。^⑤ 1908年5月20日,孙中山在给邓泽如、黄心持的信中,不仅承认“吾党财政之困难,真为十余年来所未有……自云南义师起后,更急如星火”,甚至提出“若秋君或弼翁肯任此十万,当酬以云南全省之矿权专利十年也”。^⑥

如上所述,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虽然准备发动武装起义,却没能筹集到足够的资金和武器。面对这种情况,孙中山强调,武装起义“今日之得失成败,在于能速得此款否耳”。^⑦ 可以说,这是多次武装起义无法成功的重要原因之一。

其次,需要探讨一下黄冈起义至河口起义中同盟会与天地会等会党的关系。表3列举了各次武装起义中扮演核心角色的重要人物。

表3 黄冈起义至河口起义中同盟会与天地会关系

	同盟会核心人物	秘密会党核心人物	武装起义实际指挥者	起义军主要成分
黄冈起义	孙中山、许雪秋	余丑、余通、陈涌波	余丑、余通、陈涌波	天地会等 秘密会党
七女湖起义	孙中山、邓子瑜	陈纯、林旺、孙稳	陈纯、林旺、孙稳	
防城起义	孙中山、黄兴、胡毅生	王和顺	王和顺	
镇南关起义	孙中山、黄兴、胡汉民	王和顺、黄明堂、关仁甫	黄明堂、关仁甫	
上思起义	孙中山、黄兴、黎仲实		黄兴	
河口起义	孙中山、黄兴、黎仲实	王和顺、黄明堂、关仁甫	王和顺、黄明堂、关仁甫、黄兴	

说明:1. 表3根据表1和表2所用资料制成,并且只列入起义中的核心人物。2. 虽然“同盟会核心人物”中孙中山、许雪秋、邓子瑜均曾加入天地会,所有“秘密会党核心人物”亦均曾加入同盟会,但根据他们在起义中发挥的主要作用,笔者仍将其分别归入“同盟会核心人物”与“秘密会党核心人物”栏中。

① 冯自由:《丁未惠州汕尾运械失败实录》,《革命逸史》第5集,第110—114页。

② 《致宫崎寅藏函》(1907年9月13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43页。

③ 《致何佩琼函》(1907年10月1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44—345页。

④ 《致董野长知函》(1908年1月3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57—358页。

⑤ 《致挂罗庇劳同盟会员函》(1908年4月22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65页。

⑥ 《致邓泽如黄心持函》(1908年5月20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67—369页。

⑦ 《致挂罗庇劳同盟会员函》(1908年4月22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65页。

表3同盟会核心人物中,除“革命实行者”黄兴外,以孙中山为首的同盟会核心人物均没有在起义战场上督阵过,其余起义的实际指挥者均为天地会等秘密会党首领。由此可以说,因为只有“秘密会党核心人物”才能够指挥会党,所以同盟会为发动武装起义,必须千方百计将“秘密会党核心人物”吸收到同盟会中。

例如,潮州起义就是许雪秋与潮州饶平县黄冈地区三点会首领余丑、余通、陈涌波等人联合,在同盟会成立前秘密筹备的。而同盟会成立后,许雪秋便经张永福介绍,于1906年在新加坡面见孙中山时加入了同盟会。随后他被任命为“中华民国军东江都督”,奉命在广州东江流域伺机图谋起义。^①同年冬,许雪秋带领余丑、余通、陈涌波赴香港与冯自由会面,三人随之加入同盟会。^②其实,许雪秋之所以能够与潮州三点会取得联系,一因其籍隶潮州潮安县,二因其脾气秉性与江湖侠客合得来。^③据黄冈起义时两广总督的电报和奏折可知,当时该地区的三点会势力极大,大约有三四千名成员^④,同时余丑等三点会首领还调动诏安县三点会首领沈牛屎、沈家塔一同参与起义。^⑤惠州七女湖起义也是如此。1907年孙中山在新加坡将出生于惠州归善县且参与过兴中会惠州起义的邓子瑜吸收进同盟会,并将其派遣到惠州准备发动起义。邓子瑜当时在香港进行会党动员工作,先后接触了归善县、博罗县三点会首领陈纯、林旺和孙稳。之后在陈纯等天地会首领的动员、召集下,会党军攻打惠州府城。

在防城、镇南关、上思、河口起义中,王和顺、黄明堂、关仁甫等天地会首领同样占据着举足轻重的位置。广西邕宁人王和顺最初是广西天地会武装集团黑旗军刘永福的哨官,并曾作为天地会首领与陈亚发一起参与了1902—1903年广西天地会暴动。暴动失败后,王和顺经香港逃到越南西贡避难。^⑥广东钦州大寺镇人黄明堂则是1901年前后活跃在中越边境的三合会首领。他与会党首领黄志灵联合后势力逐渐扩大,并以镇南关为中心展开一系列反清、抗法斗争。^⑦关仁甫出生于广东钦州上思,1893年加入活跃在中越边境十万大山的天地会,第二年被推举为该会首领。随后关仁甫转移到广西、云南交界地区作为天地会分派忠义会首领,曾与哥老会首领周云祥一起发动滇南起义,但最终失败,后不得已于1906年逃亡越南。^⑧如上所述,王和顺、黄明堂、关仁甫在加入同盟会之前均是著名天地会首领,且在广东、广西、云南与越南边境地区组织天地会开展反清、抗法斗争。同盟会成立以后,孙中山派黄兴等人与他们接触,并成功将其纳入同盟会。正是在他们的召集下,会党军作为主力参与了防城、镇南关、上思、河口起义。

综上所述,从潮州起义到河口起义,均与兴中会时期的武装起义类似,由孙中山等同盟会核心人物一手策划,且参加起义的秘密会党重要首领多已加入同盟会。但是作为起义军主要构成的一般会党成员并没有加入同盟会,他们只有在会党首领号召下方能集结起来参加起义。换句话说,孙中山等同盟会核心人物只是接触了天地会等会党的部分首领,而不是直接动员普通成员,所以不得

① 冯自由:《东军都督许雪秋》,《革命逸史》第2集,第184页。

② 冯自由:《丁未潮州黄冈革命军实录》,《革命逸史》第5集,第88页。

③ 冯自由:《东军都督许雪秋》,《革命逸史》第2集,第183页。

④ 《两广总督周馥为黄冈会党聚寨戕官事致军机处电》(光绪三十三年四月十五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第457页。

⑤ 《开缺两广总督周馥奏剿平黄冈乱事办理先后情形折》(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第460页。

⑥ 冯自由:《南军都督王和顺》,《革命逸史》第2集,第199—200页;刘平、王志芳:《王和顺》,孙昉、刘旭华:《海外洪门与辛亥革命·外一种:辛亥革命时期洪门人物传稿》,中国致公出版社2011年版,第283—285页。

⑦ 刘平、王志芳:《黄明堂》,孙昉、刘旭华:《海外洪门与辛亥革命·外一种:辛亥革命时期洪门人物传稿》,第287—288页。

⑧ 玉军、壮强、善愚:《关仁甫革命事略》,《八桂侨史》1992年第2期,第19页。

不完全依靠这些首领,发动武装起义。这势必导致孙中山等同盟会成员与普通会党成员脱节,不能直接指挥并控制起义军,只能听由会党首领代为领导。同盟会只有建议筹划权,而没有直接指挥权。其对会党只停留在利用层面,而没有进入改造层面,这是上述起义失利的关键因素。

最后,是对清军将领的策反问题。从潮州起义到河口起义,对清军将领的策反虽然只起到辅助作用,但如果对清军将领的策反一旦成功,就将使武装起义的影响急剧扩大,所以,这种策反也是武装起义成功的重要因素之一。防城起义和上思起义的发展和失败均与对清军将领策反有很大关系,而主要策反对象是郭人漳和赵声。

郭人漳是镇压太平天国的湘军主要将领郭松林之子。留学日本期间,他于1903年加入拒俄运动者所组织的军国民教育会,在与黄兴、张继等革命党人的交流中一定程度上接受了排满革命与民族主义思想。但他归国后,按照家族的安排,就任山西候补道台,开始踏入官场。另一方面,黄兴于1904年2月组织华兴会发动长沙起义失败后,又于同年11月赴上海组织爱国协会,当时郭人漳亦曾入会。不久,由于卷入王之春暗杀事件,郭人漳与黄兴、张继等十余人一起被捕。尔后经上海道袁树勋担保,他被释放,同时黄兴也使用假名,并以其文案师爷身份获释。在黄兴重返日本后,郭人漳赴南京,任新军教练。^①

赵声是江苏大港镇人,因义和团运动而萌发反清思想。1901年他以第一名成绩考入江南水师学堂,但受到强国会牵累而退学,后又被江南陆师学堂特别录取。在陆师学堂,赵声认识了章士钊、卢润洲等具有进步思想的同学。1903年毕业后,赵声在赴日进行军事视察途中,受黄兴、杨笃生、何香凝等人影响,革命思想逐渐高涨。归国后,他曾参与拒俄运动。1904年之后,赵声为反清而加入北洋新军,虽拟伺机而动,却并未达成其革命目标。1906年,他结识郭人漳。^②

1907年初,郭人漳任广西防营统领,而赵声任广东新军管带,由此两人再次见面。如前所述,孙中山曾对二人寄予很大希望,但由于两广总督的严密控制,郭人漳并未完全踏上革命道路,而赵声也没能找到发动起义的良好机会。

从具体历史过程看,1907年3月刘思裕领导钦州三那地区人民开始展开抗捐斗争。孙中山一面特派邝敬川到三那调查事情真相,一面为利用抗捐斗争促成革命,派黄兴、胡毅生分别到钦州郭人漳处和廉州赵声处,敦促二人与革命党共谋起义。当时已奉命镇压抗捐斗争的郭人漳,虽然表面同意反清,实际上却阳奉阴违。在王和顺正式发动钦州防城起义后,新任两广总督张人骏又命令郭人漳和赵声前往当地镇压起义。当时王和顺已经率领起义军占领防城,准备进攻钦州府城,但郭人漳非但不进行呼应,反大举反攻,并收复起义军已经占领地区。此外,赵声身在合浦,也没能找到举兵反清机会。事后,两广总督张人骏在为镇压三那抗捐斗争和防城起义将领奏报论功行赏的折子中称:“郭人漳自四月间调赴廉、钦,攻三那,复防城,搜剿钦西,无战不克”,因此“将已革陕西补用道郭人漳开复原官衔翎,留粤补用,并免缴捐复银两”。^③显而易见,郭人漳的两面做法是防城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没能及时察觉郭人漳此种态度,反而在重新策划钦、廉武装起义时再次对郭

① 高拜石:《郭人漳参加革命始末》,《古春风楼琐记》第9集,台湾新生报社1979年版,第101—104页;沈寂:《军国民教育会与同盟会的成立》,《安徽史学》2008年第1期,第55—60页。

② 郭孝义:《赵声评传》,《镇江师专学报》1998年第2期,第39—45页;黄德昭:《赵声》,中国社会科学院近代研究所中华民国史研究室编:《中华民国史人物传》第8卷,中华书局2011年版,第5283—5284页。

③ 《两广总督张人骏为钦廉剿捕获胜事致军机处电》(光绪三十三年十月二十三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第468页;冯自由:《丁未钦州防城革命军实录》,《革命逸史》第5集,第106—108页;《两广总督张人骏奏剿办廉钦革党获胜出力人员择优请奖折》(光绪三十三年十一月十九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第473页。

人漳进行策反。1908年1月28日黄兴派谭人凤前往郭人漳军营,请求武器支援,煽动其反清。但据谭人凤回忆,当时郭人漳敌视革命的态度已然鲜明。^①之后郭人漳部与黄兴所率起义军发生正面冲突,据张人骏奏称,郭人漳曾率部在小峰山歼敌数十股^②,但在随后的马笃山战斗中又被黄兴起义军击溃。由此,郭人漳视革命党人为仇敌,并悬赏三万银两捉拿黄兴。^③

总之,在同盟会正式起义计划中,并未包括策反清军将领,个别的策反工作只是基于部分革命党人与少数清军将领之私人关系。而且,郭人漳不但没有加入同盟会,与起义会党也没有干系,是个首鼠两端的“彻头彻尾机会主义者”^④,由其来支持会党起义,无异于缘木求鱼;对郭人漳的过度依赖,直接显示出同盟会武装起义战略的失败。

五、从革命宣传品看武装起义性质

对于同盟会和天地会共同开展的武装起义革命活动,应该如何定义其性质呢?从同盟会所制定的《革命方略》之《军政府宣言》可知,如果此前之革命被称为“英雄革命”,那么这次革命就应被称为“国民革命”,而同盟会宗旨则规定为“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⑤因此,本文所述六次武装起义均以推翻清朝统治,建立共和国为最终目标,而其过渡政权形式则是“军政府”,其主力军是天地会等秘密会党组成之国民军,统率者为军都督。关于军政府与国民军、军都督之关系,《革命方略》做出如下规定:

- 一、各处国民军,每军立一都督,以起义之首领任之。
- 二、军都督有全权掌理军务,便宜行事。
- 三、关于重大之外交,军都督当受命于军政府。
- 四、关于国体之制定,军都督当受命于军政府。
- 五、国旗、军政府宣言、安民布告、对外宣言,军都督当依军政府所定,不得变更。
- 六、略地、因粮等规则,军都督当依军政府所定;惟参酌机宜,得变通办理。
- 七、以上各条,为军政府与军都督未交通之前关系条件;其既交通后,另设规则以处理之。^⑥

从原则上看,军政府为起义最高指挥者,但事实上从黄冈起义到河口起义均是在没有军政府的情况下进行的,孙中山等指挥武装起义的革命党人间接起到了军政府的作用。因此,革命党人实为准“军政府”主体,而天地会等秘密会党及其首领或可视为准“军都督”和准“国民军”。

孙中山等革命党人还对革命中具体事项定有诸多政策、策略,如《革命方略》中之《军队之编制》、《战士赏恤》、《略地规则》、《因粮规则》、《安民告示》、《对外宣言》、《招降满洲将士布告》、《扫

① 石芳勤编:《谭人凤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326—327页。

② 《两广总督张人骏为缉捕转入越南之起义者事致外务部电》(光绪三十四年三月五日),《孙中山与广东——广东省档案馆馆藏海关档案选译》,第708页。

③ 饶怀民编:《刘揆一集》,湖南人民出版社2008年版,第154页。

④ Edward J. M. Rhoads, *China's Republican Revolution: The Case of Kwangtung, 1895—1913*, p. 120.

⑤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1906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6—297页。

⑥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1906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8—299页。

除满洲租税厘捐布告》等等。^①特别是,起义军每占领一处,就要首先发布安民告示,获取民心。而安民告示的主要内容就是打倒清政府专制统治,恢复中华,建立中华民国军政府,这与《军政府宣言》大同小异。据以上同盟会《革命方略》,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任命黄冈起义中的许雪秋为“国民军东军都督”、七女湖起义中的邓子瑜为“负责人”、防城起义中的王和顺为“中华民国军南军都督”、镇南关起义中的王和顺和黄明堂依次担任“镇南关都督”、任命上思起义中的黄兴为“中华民国军南军总司令”,以及河口起义中的黄明堂为“云南国民军总司令”,正式开展武装起义活动。^②

与同盟会建立具有近代性质之共和国主张相比,天地会往往承袭更具传统性质之反清复明目标。由于天地会等秘密会党首领作为起义执行者作用不容小觑,遂造成其目标亦嵌入武装起义过程。例如,两广总督周馥在奏报黄冈起义时称,陈艺生(即陈宏生)等“妄称‘大明军政都督府孙’等字样,竖旗起事”。^③不管这里的孙指的是孙中山^④还是会党首领孙光武^⑤,值得注意的是“大明”这一说法。而据闽浙总督电报,在抓捕“匪首”吴春时曾搜出两张写有“洪顺堂”的匪票。^⑥洪顺堂就是洪门,特指天地会的五房之二房;并且,天地会在举事时习惯制作印有“洪顺堂”字样之红旗。^⑦此外,《华字日报》亦报道,黄冈起义时“乱党”发布安民告示,上书“广东提督军民除满复汉”。^⑧这里的“除满复汉”就意味着同盟会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同时与天地会的“反清复明”异曲同工。

七女湖起义中也表现出很强的天地会特性。据说,当时陈纯、林旺、孙稳为扩充兵力,在归善、博罗、龙门等地发布告示称:“洋洋中国,荡荡中华,千邦进贡,万国来朝,夷人占夺,此恨难消,招兵买马,脚踏花桥,木杨起义,剿绝番苗,军民等人,英雄尽招,正面天子,立转明朝。”^⑨虽然此布告有“兵马大元帅黄”字样,但事实上与天地会传统的招军榜传单无甚差异。^⑩七女湖起义中使用的传

① 《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1906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9—318页。《招军章程》和《招降清朝兵勇条件》是河口起义后孙中山、胡汉民、汪精卫在新加坡所增订,其余文件为孙中山、黄兴、章太炎等在日本制定(《中国同盟会革命方略》(1906年),《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296页)。

② 冯自由:《丁未潮州黄冈革命军实录》,《革命逸史》第5集,第88页;冯自由:《丁未惠州七女湖革命军录》,《革命逸史》第5集,第100页;冯自由:《南军都督王和顺》,《革命逸史》第2集,第200页;邹鲁编著:《中国国民党史稿》第3编,第738页;冯自由:《戊申钦州上思革命军实录》,《革命逸史》第5集,第128页;冯自由:《戊申云南河口革命军实录》,《革命逸史》第5集,第143页。

③ 《开缺两广总督周馥奏剿平黄冈乱事办理先后情形折》(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六日),《辛亥革命前十年间民变档案史料》下册,第460页。

④ 《收开缺两广总督周馥致军机处请代奏电》(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三日),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编:《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30册,中国人民大学出版社2005年版,第435—436页。

⑤ 《十九日戌刻广州专电》,上海《时报》,1907年5月31日,第2版;又见江中孝、邓开颂主编《丁未潮州黄冈起义史料辑注与研究》,天津古籍出版社2007年版,第51页。

⑥ 《收闽督致军机处请代奏电》(光绪三十三年四月二十五日),《清代军机处电报档汇编》第30册,第439—440页。

⑦ 萧一山编:《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第5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1页;光绪《香山县志》第22卷,“纪事”,上海书店2003年影印版,第53页。

⑧ 《本馆特电:黄冈匪乱之详情》,香港《华字日报》,1907年5月30日;又见江中孝、邓开颂主编《丁未潮州黄冈起义史料辑注与研究》,第41页。

⑨ 黄珍吾:《华侨与中国革命》,台北,“国防研究院”1963年版,第117页。

⑩ John Francis Davis, *The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 Vol. 2, (London: Charles Knight & Co, 1836), p. 16, “Vast was the central nation, flourishing the heavenly dynasty, A thousand regions sent tribute; ten thousand nations did homage, But the Tartars obtained it by fraud, and this grudge can never be assuaged, Enlist soldiers, procure horse, display aloft the flowery standard, Raise troops, and seize weapons, let us exterminate the Manchow race.” 萧一山编:《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第1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7页,“招军牌:洋洋中国,汤汤天朝,千邦进贡,万国来朝,夷人占夺,此恨难消,招兵买马,高架洪桥,木杨起义,消灭满洲”;萧一山编:《近代秘密社会史料》第6卷,上海文艺出版社1991年版,第21页,“扬扬中国,汤汤天朝,千邦来贡,万国来朝,夷人占夺,此恨难消,招兵买马,高塔花桥,木杨起义,夺回满洲,招军榜,天运甲寅年七月念五日”。对此传单的较详细分析,参见李平秀《预言与叛乱——咸丰四年“陈松天地会集团”叛乱的政治背景》,“第二届中国秘密社会史国际学术研讨会”论文,山东济南,2009年,第272—274页。

单只是在此基础之上添加了“剿绝番苗,军民等人,英雄尽招,正面天子”字句,直接反映出“立转明朝”等天地会反清复明性质。纵使冯自由曾记述“黄冈既克,党军遂依革命方略所规定布告安民”^①,但上述史实表明,由于起义中同盟会派遣的许雪秋、邓子瑜并未能直接统率义军,而是由当地天地会首领负责召集会党,指挥作战,因此黄冈起义与七女湖起义均显现出很强的天地会性质。

那么,由王和顺、黄明堂、关仁甫等天地会首领直接领导的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以及河口起义又是怎样的情况呢?清政府亦认为,他们都是在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直接引导下加入同盟会的天地会首领。^②但目前,关于这些起义的革命宣传品有据可查的,只有防城起义。防城起义中,起义军曾以“中华国民军南军都督”王和顺的名义,于1907年9月3日发布《报告粤东之同胞》布告,其性质与安民告示类似,主要内容可以概括为以下四部分:第一,中国被满族控制已有两百六十年之久,生灵涂炭。酿造了扬州十日、嘉靖屠城、广州十日等屠杀惨剧。虽然在粤省爆发了太平天国运动,但最终没能驱逐满人。第二,王和顺很早便为伸张正义投身洪门,以反清复明为宗旨在南宁等地奋战数载。这里的“明”指中国,而“清”指满人,所以他并不是在为朱家尽忠,而是为中国浴血奋战。第三,王和顺在与孙中山的接触过程中,了解到治国根本和民族主义,领悟到一定要以自由、平等、博爱精神打倒专制,建立民主立宪政体。所以目前王和顺以都督身份发动武装起义。第四,因此王和顺呼吁粤省同胞一同参与伟业,鼓舞国民士气,驱逐满人政权,在敌人的首府上一定插上新的旗帜。^③从上述内容看,此告示反映出会党传统理念与孙中山近代革命理念的结合。

须注意的是,同一时期所发布的《招降满洲将士布告》完全符合同盟会《革命方略》所规定的内容,但《报告粤东之同胞》这一布告与《革命方略》所规定的内容不同,因王和顺强调自己是天地会首领和同盟会革命军都督的行为违反了同盟会《革命方略》中“国旗、军政府宣言、安民布告、对外宣言,军都督当依军政府所定,不得变更”之规定。这一现象反映出天地会首领加入同盟会后其行动和观念还在传统与近代之间徘徊的状态。兴中会时期,率领广东会党势力的天地会首领郑士良作为惠州起义司令官时曾发布告示强调,“本会乃三合会会党,又名义兴会,又名天地会……本会首并副会首等誓灭满洲,重立新君,以兴中国”^④,与上述王和顺行为如出一辙。

此外,虽然冯自由还曾提到防城起义中的“中华民国军都督王”安民告示、上思起义中的“中华民国军南军总司令黄”告示以及河口起义中的“南军都督黄明堂”告示^⑤,但遗憾的是都没有转述具体内容。其中,据唐颂南回忆,防城起义时占领防城衙门后,王和顺并不是以自己的名义而是以“张都督”的名义发布安民告示。^⑥这一点从当时《中兴日报》报道中可以得到确认:“防城会党聚众二千余人,于七月二十六日破防城……其首领名张复辉,自号中华民国军南军都督,出有吊民告示,语多光复排满字句。”^⑦池亨吉也记道,河口起义中的安民告示强调,“本军政府以义讨暴,为民

① 冯自由:《丁未潮州黄冈革命军实录》,《革命逸史》第5集,第89页。

② 《云贵总督锡良致外务部电》(光绪三十四年四月五日),中国史学会主编:《辛亥革命》第3册,上海人民出版社1957年版,第273页。

③ 《报告粤东之同胞》,香港《中国日报》,1907年9月28日,第2页。

④ 《中国近事·会党致函西报》,横滨《清议报》第62册,光绪二十六年九月十一日,第9页。

⑤ 冯自由:《丁未钦州防城革命军实录》、《戊申钦州上思革命军实录》、《戊申云南河口革命军实录》,《革命逸史》第5集,第107、128、142页。

⑥ 唐颂南:《辛亥革命前后我参加钦防两次起义的回忆》,《广州文史资料》第11辑,政协广州市文史资料委员会1964年编印,第77页。

⑦ 《防城党军起事情形(广东)》,新加坡《中兴日报》,1907年9月30日,第2版;又见《十次起义史料》,《革命文献》第67辑,第87—88页。

请命”,除“叛乱者”等十二条例处死刑外,还有如“私斗杀伤”等八项惩罚条例。^①实际上这些内容均与同盟会《革命方略》规定中的安民告示性质不同。

结论

本文对同盟会成立后发生的六次武装起义加以分析,从中得出几点结论:

首先要声明,现存史料大多系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所作,而天地会方面相对处于“失语”状态。故在分析同盟会与天地会武装起义时必然会存在一定局限性。我们固然不能否认正是冯自由、邹鲁等革命党人在民国时代呕心沥血的历史记述,使得如今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与辛亥革命研究有据可依,但这种由历史参与者叙述历史的方式本身就存有问题,因叙述者之立场、关注点及了解情况存在局限,其记述每每会多出一份主观,少了几许客观,多出一份感情,少了几许理智。现存史料的畸轻畸重也是造成“孙中山中心史观”乃至“革命派中心史观”主导学术研究的原因之一。借用一位学者的话,随着“(人工)神话和(历史)真相之间差异的增加”,“秘密结社的角色就被固定化了”。^②当然,本文写作目的不是要专门评判这些史观的对与错,而是希望在分析和理解历史事件时能够摆正视角,以公平的尺子丈量历史。

其次,本文对潮州、惠州、钦州、廉州“同时起义”说法进行了讨论。通过对黄冈起义至河口起义等一系列武装起义展开过程的分析可以看出,所谓的“同时起义”不过是孙中山的一种希冀而已,而孙中山留下的文字也印证了并无“同时起义”的计划。至于武装起义的展开过程,大致可做如下概括:

1906年12月,孙中山受到萍浏醴起义的激励,基于同盟会《革命方略》的战略部署,在两广地区与天地会等秘密会党进行合作,制订了推翻清政府建立共和国的“大计划”,并且还为此制订了数个“小计划”。第一个小计划是占领广州,设立军政府。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先计划从罗定、肇庆突袭广州,不幸失败;孙中山继而又从日本赴越南策划发动黄冈起义,及紧随其后的七女湖起义。须注意,以黄冈起义为代表的东军方面的武装起义,实际上是在同盟会成立之前由南洋华侨积极计划并促进开展的。无论怎样,随着东军方向的武装起义毫无进展,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开始将视线集中到西军方向。这就是第二个小计划,即占领广西南宁成立军政府。该计划直接促成的是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和上思起义的相继爆发,遗憾的是这些起义均以失败告终。孙中山等革命党人遂又开始着手第三个小计划,即发动河口起义,在云南昆明建立军政府。所有这些起义的依靠力量多是以天地会为主的会党势力。关于这一系列的起义,孙中山在1909年10月写给吴稚晖的信中做出如下说明:

自庚子以后,中国内外人心思想日开,革命风潮日涨。忽而萍乡之事起,人心大为欢迎。时我在日本,财力甚窘,运掉[调]不灵,乃忽有他方一同志许助五万金,始从事派人通达湖湘消息,而萍乡军已以无械而散矣。惟有此刺激,人心已不可止,故定计南行,得日人资万四千元及前述所许五万元,以谋起义。初从事潮惠,潮黄冈以未期而动,事遂不成;惠七女湖怆悻[仓

^① [日]池亨吉著,乐嗣炳译:《中国革命实地见闻录》,罗家伦主编:《中华民国史料丛编》第A18册,中国国民党中央委员会党史史料编纂委员会1983年影印版,第16—19页(总第46—49页)。

^② John Lust, "Secret Societies, Popular Movements, and the 1911 Revolution," in Jean Chesneaux (eds.), *Popular Movement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China 1840—1950* (California: Stan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2), p. 173.

卒]应之,亦属无功。吾人遂转向钦廉,与该处军队相约,遂破防城,围灵山。惟此时所有之资以买械而尽,而安南同志虽陆续集款以助军需,精卫又亲往南洋筹资,惟所得不多;钦军统领终以资少不肯如约反正,钦事遂不成。吾人转破镇南关炮台,以促钦军之动,事又不成。我遂出关而入安南,过文渊,为清侦探所悉。广西官吏托龙州法领事到安南查我踪迹,知我寓某街洋楼,密告清政府,与法政府交涉,逼我退出安南。我遂往星加坡。我到星加坡后则河口之事起,占据四炮台,诛彼边防督办,收降清兵陆营。本可进取,据有全滇,惜当时指挥无人,粮食不继遂退。^①

从上述孙中山的总结中可以看出,除自罗定、肇庆突袭广州之计划外,从黄冈起义到河口起义的六次武装起义并不存在潮州、惠州、钦州、廉州“同时起义”。在这里,如果我们认真分析“同时起义”的提出背景,就可以知道冯自由、邹鲁等国民党史家在叙述历史时,单纯从历史结果出发,过分强调孙中山和同盟会的作用,以至于掩盖了“历史过程的真相”,把各个不同的武装起义展开过程视为一个具有连续性的事件,遂倾向于“结果论的解释”。进一步说来,与此相关的另一个传统说法,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越南河内设立“粤桂滇三省起义的领导机关”作为指挥大本营,实际上也是从结果论的角度对“同时起义”说的发展。总之,笔者认为对以上传统观点须作修正。

其三,武装起义的角色以及起义失败的原因。综观六次起义参与组织、人员的关系,可将其约略分为四类:孙中山等同盟会人士构成的“设计组织”,天地会等秘密会党首领组成的“执行组织”,由捐献巨额资金、提供武器供给的华侨、日本后援者构成的“援助组织”,此外,起义组织者还对清军将领进行策反,而这些清军将领及所部便为“辅助组织”。

其中,孙中山等同盟会核心人士作为起义的设计组织,在起义过程中并没有发挥其应尽的责任。由于他们一直面临着资金筹集不利、武器供给不足问题,所以每逢起义爆发,都不能为起义军及时提供后续支援。另外,其对于徘徊在参与革命和反对革命之间的郭人漳等人的过分执着的期待也是招致起义失败的重要原因。因此,即使不谈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发动武装起义的行为是不是“空想的机会主义”抑或“军事的冒险主义”,之前将武装起义失败的原因主要归结于天地会等秘密会党的阶级落后性、组织散漫性的说法就值得我们反思,因为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在开始起义前必然对秘密会党的上述性质已经有所了解。由此可见,作为起义的设计组织,同盟会应对起义的失败负根本性责任。

最后,在探讨武装起义中同盟会与天地会关系的同时,还应重新评估天地会等秘密会党的主体性和自觉性问题。一般观点认为,同盟会动员天地会等秘密会党发动了武装起义,但是严格来讲,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只是与几名天地会首领进行了接触,而武装起义的主力军实际上是由这些会党首领召集而来的;由此,只是会党首领加入了同盟会,而参加起义的大部分起义军成员却没能加入。这种武装起义的结构与同盟会的前身兴中会时期基本一致,革命党与会党合作关系的建立均以会党首领为媒介。亦因这种结构,使得在双方合作中,秘密会党同样表现出反抗清朝的主体意识和自觉意识。

进而言之,这也可以说是传统性较浓的旧式团体天地会与近代性质较强的新式团体同盟会的合作关系。以天地会首领身份加入同盟会的余丑、余通、陈涌波、陈纯、林旺、孙稳、王和顺、黄明堂、关仁甫等起义指挥者,他们既沿袭了传统思想,也受到某些近代理念的影响,即处于一种新旧杂陈的状态。由这些人召集的会党军更是严重保留着传统的观念和行为习惯。他们对同盟会《革命方

^① 《致吴稚晖函》(1909年10月下旬),《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21页。

略》中涉及的共和革命有关的概念,例如革命、自由、平等、博爱、国家、民族、民国、国民、民生、地权、宪法、总统、议员等的理解要远远少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甚至一无所知。同时,起义者利用天地会招军榜传单传统语言,在反清复明的口号下号召义军,也证明比起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主张的共和革命来说,天地会反清复明这一旧口号在一般民众中仍具极大号召力。虽然史料记载存在偏颇,但这些记录至少在一定程度上反映出武装起义中天地会等秘密会党的主体性和自觉性,并曲折反映出近代革命团体同盟会与传统秘密会党天地会历史的具体合作形式。

虽然20世纪初以两广地区为中心展开的六次武装起义全部失败了,却给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提供了思考共和革命、反思起义战略的机会。用1908年6月孙中山的话来讲,这就是“经一次失败,即多一次进步,然则失败者进步之原因也”,只有通过这样的屡仆屡起才能达成终极目标。^①1909年3月2日孙中山致信宫崎寅藏强调:“河口以后,已决不再为轻举,欲暂养回元气,方图再发。”^②1910年至1911年两次续起的起义便反映出了孙中山的这种想法。与此同步,清末天地会等秘密会党的斗争虽仍带有传统色彩,却也有相当进步,其中关键点就是“反清”不单纯与“复明”相牵连,而与孙中山的“共和革命”相挂钩。在这一点上,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是引领的旗帜,是新蓝图的构建者和新时代的召唤人,而共襄义举的会党会众则是与时俱进的追随者和新理想的践行者。

[作者李平秀,韩国成均馆大学东亚学术院研究教授,首尔,110745,hmhuidang@163.com]

(责任编辑:谢维)

^① 《〈支那革命实记〉序》(1908年6月),《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325页。

^② 《致宫崎寅藏》(1909年3月2日),《孙中山全集》第1卷,第404页。

Modern Chinese History Studies

No. 1, 2015

Essays Commemorating the 100th Anniversary of the Birth of Marxist Historian Liu Danian
Opinions on Liu Danian's Ideas about Historiography Zhang Haipeng (4)

The Contemporary Value of Liu Danian's Ideas about Historiography Huang Renguo (9)

Keeping Watch on the Battlefield of Marxist Historiography Studies—The Case of *On Objects of Historical Studies* by Liu Danian Zhang Guangzhi (13)

Seeking Truth, the Inherent Quality of a Scholar—Recalling Comrade Danian and the Studies of China's War of Resistance against Japan Wang Jianlang (16)

The Academic Value of *On Modern Classical Studies* by Liu Danian Li Jian, Fu Yongju (20)

The Academic Contributions of *On Kangxi* by Liu Danian and the Inspiration It Provided to Qing History Studies Cheng Qichun (25)

Liu Danian and Academic Organization Work Zhao Qingyun (29)

The Legal Nature of *The Articles of Favorable Treatment of the Great Qing Emperor after His Abdication* and Responsibilities in the Case of a Breach—An Analysis Based on the Qing Court's Change in the Agreement Forced by the Regency Cabinet after the 1924 Beijing Coup Yang Tianhong (37)

After the Beijing coup of 1924 sparked controversies between Hu Shi and the Regency Cabinet and its supporters over the quality of *The Articles of Favorable Treatment of the Great Qing Emperor after His Abdication*, the Regency Cabinet forced the Qing court to change the agreement, which created many unresolved mysteries in legal history. Analysis of historical facts and legal principles tells us that *The Articles* was a bilateral legal and political agreement between the Republican government and the Qing court. It was not—contrary to the arguments of one faction at the time and many scholars since—just a one-sided gift from the Republican government to the abdicated Qing emperor that could be revised unilaterally. As to the implementation of the agreement, the Qing court did frequently violate it, but the articles of the agreement were also vague and lent themselves to different understandings. In addition, the Republican government that criticized the Qing court for breaking the agreement also owed money in violation of the agreement for a long time. As for the revision of the articles, in addition to the problems raised by the Regency Cabinet—such as that the monarch returned to the throne must bear criminal responsibility and that the Qing court did not keep its promise to move out of the court—the revision formalities themselves also became a challenge. Basically speaking, under the premise that—because the Regency Cabinet did not dare to acknowledge that its acts were “revolutionary” or contained any “revolutionary” meanings—the persons concerned would recognize the problems in a legal framework, the establishment of the Cabinet was not to be regarded as legitimate. Because this behavior did not have a legitimate legal basis, the revision of the Articles naturally cannot be considered to be legal.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s and Secret Societies in the Late Qing Period: Centered on the Armed Uprisings of the Tongmenghui Lee Pyongsoo (58)

Through analysis of six armed uprisings of the Tongmenghui (Chinese United League), this article re-examines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revolutionary organizations and secret societies. The perspective of this article differs from the “Sun Yat-sen-centered historical viewpoint” or the “revolution-centered historical viewpoint.” Based on this position, the author first argues that the phenomena traditionally referred to as “simultaneous uprisings” and the “leadership body of the Guangdong-Guizhou-Yunnan Uprising” actually did not exist. Second,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organizations that promoted uprisings can generally be divided into four categories: “design organizations,” including those constructed by Sun Yat-sen and other members of the Tongmenghui; “implementation organizations,” composed of the leaders of the Heaven and Earth Society and other secret societies; “support organizations,” constructed by overseas Chinese and Japanese sponsors; and “auxiliary organizations,” composed of the Qing generals and their troops. Among these, design organizations should take basic responsibility for the failure of those uprisings. Finally, the structures of these armed uprisings were basically similar to that of the Xingzhonghui (the Tongmenghui's predecessor); they were all co-operative relations between the Tongmenghui and secret societies, formed with leaders of the Heaven and Earth Society and other secret societies as the mediums. While cooperating like this, the secret societies also had the primary, conscious goal of resisting the Qing dynasty.